

新注

中国古典名著

今译

孙雍长 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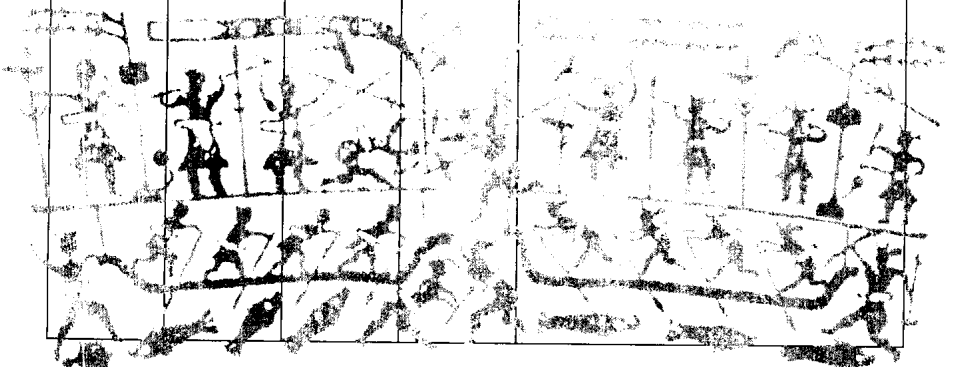
老子



老子

孙雍长注译

花城出版社



老 子

孙雍长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州市西湖路 51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1 插页 350,000 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2603—X

I·2226 定 价: 18.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他的人格是高尚的、伟大的，
他精神深处却很忧郁、痛苦；
但他从来未曾有过呻吟悲叹，
似乎生活得非常恬淡、逍遥。
所以世人只知晓他博学睿智，
却没有了解他的伟大、高尚，
更未曾懂得他的痛苦和忧郁。
夕阳秋风，咸阳古道，
一匹羸瘠青牛驮着他的
疲老身躯，低唱浅吟，
西出函谷，飘然而逝。
他为什么要远走离去？
他又到了何方？
终老子何处？
人们都不得而知，
尔后只是深情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啊，李耳，老聃，老子！

一、老子其人与其书

老子是我国古代哲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

始者。老子精神与思想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观念发生过并一直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学说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老子》一书文约义贍，言辞隽永，是一部不朽的哲理诗集，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光辉巨著。

关于老子的生平事迹，《史记·老子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归纳起来，司马迁告诉我们的有这么几点：第一，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苦县人，生活在东周季世春秋时代，与孔子同时，可能年长于孔子，曾担任过周王室的图籍管理工作。第二，孔子曾向老子请教礼，老子则以顺时而行、盛德若愚、去骄气、去

多欲、去态色^①、去淫志等修身养德之道相告诫，孔子为之感叹，将老子比为不可羁致约束，高深莫测的龙。第三，老子致力于自隐（不自我表现）、无名的个人道德修养，他见东周季世道德衰微，不愿生活于该社会，便出关西隐，世人莫知其所终。第四，老子著书，是他出关西隐之时应关令尹喜所请。其书分上、下篇，核心内容是对“道”和“德”的阐述，共有五千多字。所以后世称其书为《道德经》，又称为《五千言》，或直称为《老子》。

司马迁是位严谨的史官、学者，他的《史记》记叙殷王世系，也曾为人怀疑，但后来的考古材料完全证明了其记载并非传闻臆测之言。我们认为，司马迁关于老子的简略介绍不无事实依据，应基本上是可信的。在《史记》之前，如《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礼记》等文献中都曾提到老子或老聃的名，或称引过老子的言论行事。应该肯定老子是确有其人的。至于《史记·老子列传》中还曾提到老莱子与太史儋两个人，那只是记叙“或曰”罢了，太史公本人是并不相信老子即是老莱子或太史儋的，这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明确地以“老子”与“老莱子”为二人可知。

老子确有其人，《老子》一书为老子本人所著，这两个基本事实是不容轻易否定的。后世有人怀疑老子是否真有其人，又进而怀疑《老子》是一部伪书，都缺乏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林语堂先生说得好：“有些学者对‘是否有老子这个人的存在’抱着极大的怀疑，导致这项怀疑的主因，是清代批评怀疑主义的

① 态色即能色，谓自现逞能之色。古“能”字与“态”字多通用。

盛行，尤其梁启超的评论，更使老子的书遭到致命的打击。他认为：老子的书是在西元三百年由某些人所杜撰的。这许多没有依据、意欲惊人的言论，使得一般人几乎无法区别何为伪书？何为真著？因此，如果听到某位学者说那本《老子》或《庄子》是伪书，却又无法提出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时，我们还是不轻易直信。这种随意批评的风气，带给人们许多不便和反感。”^①当然，正因为《老子》成书甚早，所以在长期流传过程中，难免有后世如战国时期的某些内容或词句属杂进去，这也是应当看到的。

司马迁说老子是楚苦县人，苦县原来叫相，春秋后期属陈国（或以为属宋国），因为“相县荒虚”，所以楚灭陈后被改称为“苦”。老子出生和年少时期，陈国还存在，所以有些学者说老子是陈国相人；老子晚年和死时，楚已灭陈，相县已改名为苦县，所以司马迁说他是楚苦县人。古代的相或苦县与汉代的沛郡相近，大概在今安徽亳州河南鹿邑之间。

老子姓“李”，叫李耳，外字聃（外字如同外号、译名），何以又叫做“老子”呢？有些学者认为，古代早先是只有“老”姓而无“李”姓，“古韵‘老’属幽部，‘李’属之部，二部音近，古或不分”，“‘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②。但《史记》明说老子姓“李”，如果司马迁的记载并没有错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李耳长寿^③，外字“聃”，所以人们称他为“老聃”，“老”是寿老之称，不是

① 《林语堂选集·老子的智慧》第11—12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② 参高亨《老子正诂》第157—158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③ 《史记·老子列传》称：“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姓氏之称；出于崇敬，后来又在“老聃”称呼的基础上不称其外字，而缀以“子”这一尊美之词，所以便有了“老子”之称。

《老子》一书在后世流传的版本很多，现在通行的是魏王弼的注本。关于《老子》的版本流派，朱谦之先生评介说：“《老子道德经》旧本，流传最广者，有河上公、王弼二种。河上本近民间系统，文句简古，其流派为景龙碑本、遂州碑本与敦煌本，多古字，亦杂俗俚。王本属文人系统，文笔晓畅，其流派为苏辙、陆希声、吴澄诸本，多善属文，而参错已见，与古《老子》相远。自开元御注本出，因时世俗尚，依违于河上、王弼二本之间。今所见正统《道藏》中者，非从开元御注如强思齐、杜光庭、李约、刘惟永辈，即从政和御注如李霖、邵若愚、江澈、彭耜诸本。若明太祖，则上承吴澄，下开《大典》，其皆非六朝旧本，固无可疑也。然则言旧本者，严遵与傅奕尚矣。严遵本与河上本相接近，傅奕则为王弼本之发展，此为《老子》旧本之两大系统。……以河上本与王弼本相较，《唐书·刘子玄传》称《老子》无河上公注，欲废之而立王弼，为识者所讥。实则即据宋刊河上与王本对勘，其优劣可见。一、河上所用文字较古：如二章‘长短相形’，王本作‘长短相较’。毕沅曰：‘古无“较”字，本文以“形”与“倾”为韵，不应作“较”。’三十七章‘我无欲而民自樸’，‘樸’字河上本作‘朴’，景龙、敦煌均作‘朴’。五十五章‘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王本‘峻’作‘全’，‘全’字误。二、河上本于义为优：如三章‘使心不乱’，王本‘心’上有‘民’字，赘。九章‘功成、名遂、身退’，王本‘名遂’二字缺。五十一章河上本‘成之熟之’，王本作‘亭之毒之’。……三、河上本合韵：如十五章‘伊兮其若客’，毕沅曰：‘河上公作“伊兮其若客”。王弼作“伊兮其若容”，非是。“客”与“释”、“朴”等字为韵也。’四、河上本与

严遵本、景龙碑本、遂州碑本多相合；至敦煌发见之六朝唐写本，则为河上本之古钞本。五、河上本较王本为早：如五十五章，河上本‘毒虫不螫’，王本作‘蜂蛰、虺蛇不螫’。案，此六字乃河上公注，王本误以河上公注属入，此为王本后于河上之铁证。六、王本多脱文：如四十六章，河上本有‘罪莫大于可欲’句，严本、傅本及《韩非·解老》同，王本无此句。四十九章‘圣人皆孩之’上，河上本有‘百姓皆注其耳目’句，王本误脱。由上各点，可见河上本与王本较，以河上本为优。但同在河上本之中，又有北方传本与南方传本之不同。宋刊本介在南北两本之间，盖在王本盛行之时，曾据王本妄改经文者，此可以中间本称之。北方本以敦煌发见之六期、唐写本为代表，即敦煌本。南方本则以日本奈良圣语藏镰仓旧抄《卷子》残本及东北大学教授武内义雄所藏室町时代抄本为代表。就中北方本又优于南方本。”^①当然，王弼本也自有其优点，并未尽如朱先生所论，这是应当看到的。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为老子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资料。帛书《老子》甲本字体在篆隶之间，用字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其抄写年代当在汉之前，最晚也在汉高祖时代；其乙本为隶书，用字避刘邦讳而不避惠帝刘盈讳，推算其抄写年代当在惠帝或吕后时期。两种写本距今都已两千多年，是至今所见到的《老子》最古本^②。帛书《老子》甲、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后世通行的王弼注本正相反。甲本文字残缺尤多，某些段落有

① 朱谦之《老子校释·序文》，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版。

② 由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整理，文物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了《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线装本，1976年出版排印本。

圆点标识，段落分合与通行的王弼本有一定差异。乙本不分章。两本的章次完全一致，有几处则与王本不同。凡字词之相异者，寻绎文义，帛书本见优者为多。

研究《老子》，现在大家都渐渐注意到了属于民间系统的河上本及景龙碑本、敦煌抄本的资料价值，帛书本的珍贵更越来越受到重视。今后，在《老子》研究的资料运用方面，应当把通行的属于文人系统的王弼本与属于民间系统的帛书本及河上本、景龙碑本、敦煌抄本等结合起来使用，使《老子》一书尽可能更多地接近其古本原貌。

二、老子的人格与精神

老子的人格是伟大的、高尚的；其精神看似恬淡、平静，但体察其深处，却让人感受到一种隐幽的忧郁和痛苦之情。

以往，人们都认为老子的处世哲学是厌世、避世，这实在是没有真正了解老子，一直误解了老子。认真研读《五千言》，我们深深地、切实地感受到，老子的处世哲学就其本意而言是进取的，积极的。老子的思想不仅不是厌世避世，而且反倒是非常非常地热爱人世，关心人世。孔子是热爱人世，关心人世的，老子也是热爱人世、关心人世的。所不同的只是，孔子采取从政求仕，推行仁义的办法来求得自己的理想社会，老子则是采取坐进此道，提倡无为的办法来求得自己的理想社会。孔子道不行，曾想到乘桴槎以游，但到底离不开自己所热爱关心的人世，所以退而论《诗》、《书》，授弟子，以寄托自己的情志；老子道不行，但又摆脱不了因热爱人世、关心人世所产生的忧郁和痛苦，所以只好乘青牛出关西游，莫知其所终。从这点来说，从他的这种个人最终行为来说，似乎是采取了避世态度。但

是，这是老子情感、精神的不得已，而不是老子思想、老子哲学的厌世和避世。

老子自己说过：“言有宗，事有君。”（《老子》第七十章）《老子》一书的核心内容、宗旨是什么呢？司马迁归结为“言‘道’、‘德’之意”。对谁言“道”、“德”之意？为什么要言“道”、“德”之意？我们认为，老子是因了关心人世、热爱人世所产生的忧郁和痛苦，而向国君人主，向统治者来进言其“道”、“德”之意的。

老子生活在春秋后期，那正是社会剧变的一个历史时期。自平王东迁，周王室的权威日益衰微，诸侯、卿大夫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尤其到了春秋后期，各诸侯国更加积极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不断地进行兼并他国土地、掠夺他人财货的战争，社会秩序已处于“礼崩乐坏”的局面。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老子看到并揭示了处于分化、对立状态的两种社会层面的情景：一方面，上层统治者在不断从事战争的同时，多欲而“不知足”，“妄作”而“损不足以奉有余”，竭力追求“生生之厚”，过着“朝甚除”，“服文采，带利剑，财货有余，是谓盗夸”式的奢靡荒淫生活；另一方面，下层民众在“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的境况下，“田甚芜，仓甚虚”，不仅不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而且在饥寒逼迫中，已经走到了“不畏威”，“不畏死”的地步。出于对下层民众疾苦的关注，老子不断地向上层统治者发出了告诫。他警告统治者：“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统治者的贪欲表现在“生生之厚”，而“生生之厚”正是“死之途”。贪欲之心应当加以遏止，而不应放纵，如果“塞其兑，闭其门”，则可“终身不勤”；如果“开其兑，济其事”，便将“终身不救”。老子委婉地奉劝：“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

而王公以为称。”既然统治者以“孤”、“寡”、“不谷”自称，就应名符其实，塞闭其“兑”、“门”。老子还告诫说，“民不畏死”，统治者不要企图“以死惧之”；人的性命受之于“天”，生死出于自然，自然才是人类的“司杀者”。只有“司杀者杀”，统治者不能操纵生杀大权，代天行罚，“代司杀者杀”。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人一种最早、最质朴，也是最彻底的人权思想。为了促使统治者止欲爱民，老子正面向他们提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谓爱，是说要爱民；“俭”谓约束，是说要约止贪欲；“不敢为天下先”是说要谦退不争，对统治者而言，自然最大的不争是指不争战。老子还指出，个人的修身与治家国是一致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如此才能做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修身与治国的一致，老子归结为一条原则，名之曰“无为”。老子向统治者呼吁：“爱民治国，能无为乎？”以“无为”的原则爱民，不要有心去爱，因为有心便会偏袒，应当像天地那样自然地、无所偏私地普爱万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认为，“不仁”之仁，才是最大的真正的仁爱。以“无为”的原则治国，不要有心去治，不要有心追求作为，有心便会“妄作”，应当像天地那样虚静而功用却永不衰竭：“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屈）。对于统治者而言，老子认为，他们的“为”便应是“为无为”：“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老子主张按“无

为”的原则来治国，其实质精神是指遵循、依照自然规律来达成目的，并且达成目的而不恃恩居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指出，“无为”便可取得天下之治，“有为”便将使天下大坏：“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为无为，则无不治。”“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无为”之政不苛察，社会风气便淳和；“有为”之政必苛察，人心就会狡诈险恶：“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还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劝导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治国无为，统治者便应“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欲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伪；不见欲可，使民不乱。”应当守冲，“致虚寂，守静笃”。老子还特别强调，治大国尤应无为，因为“治大国若烹小鲜”，如果滋事妄作，必致败坏；反之，若以虚静无为的原则来治理大国，大国便能像江海一样成为“百谷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大者宜为下。”“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正因为大国难治，所以老子主张“小国寡民”。

《老子》一书中所反复称道的“圣人”，便正是老子推崇的、理想中的能实行无为之治的国君：“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认为，只有不崇尚财富，才能使百姓不竞争；不看重稀有之

物，才能使人们不虚假诈伪；不把足以引发贪欲的东西显露出来，才能使人们不受扰乱。要“绝圣弃智”，才能“民利百倍”。“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不为，则无不治。”老子理想中的“圣人”，一方面是无私的，另一方面又是有私的。说圣人有“私”，是因为圣人“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把爱惜自我、看重自我看得比治理天下更重要。但正因为圣人珍惜自我，看重生命，才不致多欲妄作，人们才可放心地把天下寄托于圣人：“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但圣人的有“私”不是一般人的那种自私自利，而恰恰是一种最大的无私，因为在功名财利面前，圣人能置身度外，圣人能效法天地那样“不自生”：“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圣人对百姓一视同仁，无所偏爱，如同天地之于万物无有任何偏私爱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无偏私，而普助所有的人，所以在圣人面前不存在有被遗弃的人和物：“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因为圣人普助所有的人，所以把百姓的心愿看成自己的心愿，而不师心自用：“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被褐怀玉”，内心纯洁美好，外则与常人同，“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不欲琬琰如玉”，而是“珞珞如石”。“圣人为腹不为目”，“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所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圣人“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

华”。“圣人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廉而不刿”。“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而不恃恩图报。圣人为“社稷主”、“天下王”，因为圣人能“受国之垢”，“受国不祥”。以无为的原则治国，“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圣人循天道行事，“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浑焉”，“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只有像“圣人”这样“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终不为大”，“悠兮其贵言”，下民但知有之的国君，才是老子理想中的最好的“太上”之君。

在老子的思想观念中，一个国君能“为无为”，便是其最高尚、最伟大的“德”。这种“德”，老子或称之为“玄德”：“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或谓之“上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或谓之“常德”：“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或谓之“孔德”：“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德”之言得，稟受于天性，得之于自然，是谓“德”，所以“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作为“圣人”，作为理想之国君的“德”，应是“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德若渝”。老子反复强调，因为无为为上德、玄德，所以德之为性贵柔弱。因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由婴儿赤子之性，老子悟彻到柔弱之胜于刚强：“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

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由水之为物，老子悟彻到柔弱之胜于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由人及草木之生死，老子悟彻到柔弱之胜于刚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途）；柔弱者，生之徒（途）。”柔弱胜刚强，柔弱才是真正的强大，所以老子告诫统治者要“守柔”：“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守柔曰‘强’”，“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因为无为为上德、玄德，所以德之为性贵虚静：“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辘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守静便是无为，“有为”必是“妄作”，所以老子告诫统治者要“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因为无为为上德、玄德，所以德之为性要紧的是返朴归真，看重的尤其是个“朴”字：“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无为之德是上德、玄德，所以对当时现实社会所倡导的“仁”、“义”、“礼”、“智”、“忠”、“孝”等伦理观念和行为，老子是否定的，反对的。老子认为，“仁”、“义”是“道”与“德”先后丧失的产物：“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智”、“忠”、“孝”，更是世风日下的

产物：“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智），道之华而愚之始。”天地无私，不讲仁爱，才是最大的仁爱；圣人无私，不讲仁爱，才是最大的仁爱。所以老子主张绝弃“仁”、“义”、“圣”（慧）、“智”、“巧”、“利”：“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尤其反对“智”，厌恶“智”，认为“智”是国家难治，天下败坏的直接根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如何才能具备“上德”或“玄德”呢？换言之，“上德”、“玄德”的源泉在哪里？老子的答案是把它归结于宇宙自然中最原始、最本质的唯一存在——“道”。这个“道”是万物之本原，它先于天地而存在，是天地万物更是人类所应遵循所应效法的最高准则和典范：“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效法自然，其存在本身就是自然之永恒规律，不会有任何改易变化；它虚寂幽玄，但功用却永无穷竭；它混沌素朴，和光同尘，故为天地万物之宗；只知它先于天地而存在，却不知它究竟由何而有：“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认为，混沌判分天地，混沌又由道而生，泰初有无之混沌即为“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既为“道”之直